

茅盾与《汉口民国日报》

邓 涛



青年茅盾

《汉口民国日报》报样



10日又发社论《蒋逆败象毕露了》(署名“珠”),文中指出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一须武装民众,二须严厉镇压武汉反动派,三须根本铲除乡村封建势力”。

11日发表社论《巩固后方》(署名“珠”)。当天,驻汉口的英国水兵开枪打伤码头工人1人,工人闻讯云集,外交团派员到场调查。次日,署名“雁冰”的社论《英帝国主义又挑衅》发表。13日,发表社论《前方胜利中我们的责任》(署名“珠”)。16日发表社论《祝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特别党部成立大会》(署名“雁

冰”,以下亦然)。20日,发表社论《巩固工农群众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21日发表政论《工商业者工农群众的革命同盟与民主政权》,希望工商业者加入革命阵线。

批判反动军阀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当日叛军即被击溃,武汉人心大定。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夏斗寅失败的结果》,指出:“夏斗寅的失败是对蒋介石的沉重打击。”23日发表社论《我们的出路》,指出:“我们有出路!我们已经到了出路之口,再进一步,就是胜利!”25日副刊第20号发表杂文《“五卅”走近我们了》。26日的社论《整理革命势力》指出:整理革命势力的目的是“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确定乡村的民主政权”,“切切实实为一般农民谋利益”。29日,发表社论《英俄绝交之观察》。

6月4日,署名“雁冰”(下同)的散文《读李品仙军长等东电》见报。6日发表社论《民众应认识有奖债券之性质》,9日发表社论《郑洛克复后之革命形势》,11日发表社论《杨森溃败之观察》,12日发表社论《负伤同志的娱乐问题》,13日发表社论《欢迎中央委员会暨军事领袖凯旋与湖南代表团之请愿》,14日发表社论《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15日发表政论《长沙事件》,18日发表

社论《肃清各县的土豪劣绅》,24日发表社论《论上海之反日运动》揭露蒋介石暗中指使红枪会以反日为幌子,在信阳、柳林等地掘断路轨扰乱北伐军后防的罪恶阴谋。

7月7日,署名“雁冰”的社论《武汉市民怎样解除目前经济的痛苦》发表。第二天茅盾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辞去主编一职。当天就和毛泽民一道转入“地下”,“失踪”在一个栈房里。

隐蔽了半个月光景,茅盾和宋云彬等人奉命赴九江,到达后因路途阻塞,经姑岭回到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开始了文学活动,先后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连续的中篇小说。

7月18日,董必武辞去《汉口民国日报》经理职务。1927年7月宁汉合流,共产党人被迫撤出报馆,报纸性质随之改变。该报于同年9月30日终刊。

“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报”

《汉口民国日报》是全国性的报纸,它在上海、北京、广州、南昌、长沙、福州、莫斯科、日内瓦、伦敦、巴黎、纽约都聘有特约通讯员。该报日出12版,巧妙地把贯彻孙中山制定的新三民主义政纲与宣传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相结合,内容丰富,综合性、战斗性强。它开辟多种专栏,大量刊登工农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如实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武汉政府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茅盾负责审稿,尔后写一篇千字社论,或斥责蒋介石,或鼓吹国民党。编辑部的编辑除一人是国民党左派外,石信嘉、孙际旦、宋云彬、马哲民(马念一)、李达可、倪文海等都是共产党员。

据《茅盾回忆录》记载:就这报的性质,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报。报纸的办报方针、宣传内容、经营管理由中宣部确定,茅盾任主编期间瞿秋白兼管武汉的宣传工作。“四一二”前夕,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瞿秋白指示茅盾要着重三方面的宣传,一是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二是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三是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

由茅盾主笔的34篇社论和其他文章,大体分为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大造工农群众运动的声势,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士气,作继续北伐的舆论动员;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鼓吹反帝革命斗争;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讨论。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坚持党的战斗风格和策略性,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当于大学水平,这样的人才能搞调研工作。

有的学员要从ABC学起,时间需要长些,学一年之后即期满,以后到工作中去再提高。不要再学更长时间。已有一年程度的人,再学半年即可。学员来后先考一下,除按程度分班外,还要照顾到年龄。学口语的可以搞阅读。

缺点,分班程度不齐,一个班四个程度,教员忙,辅导少。学员水平不同,英、法、西语加起来不到百人。学员毕业后要求看懂亚非国家报纸,英美报刊散文等则不要求他们看懂。还有一个结合中美公报的台湾问题的单元可以考虑选用。教材编写要留有余地,国际问题单元容易过时,需要及时修改。选外电要经常改动,怪句、长句、生字、少用字稍稍改动。

从上述记录中可见,当时选调培训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多数显然不高,而且培训完全是应急、突击式的,颇有“急用先学”的况味。这让那些大学教授们不得不“创新”适合现实要求的教学方法。记得母亲说,她教过的班,最少时只有三五个人,还都是大使级外交官夫人。她的任务是教她们日常用简单英语会话,教学方式是模拟社交场景“聊天”,使夫人们在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生活、交际用语,以应对出使任务。如此初级的“活学活用”虽属应急,却也有些“立竿见影”的效果。

外交工作无小事,应急、突击式的短期培训终非长久之计。1977年10月26日,“文革”结束一年后,包括我母亲在内的35位教师联名请求恢复外交学院。

1978年国务院第166号文件决定恢复外交学院,开始正式招生,陆续培养大批年轻外交人才。

吴镛1949年后才剃辮子

刘建东



新中国成立后,江苏省武进县政协会议中,有人发现其中一位委员居然还拖着辮子。他叫吴镛,曾任焦溪中学校长,擅诗文书法,著有《白玉诗抄》《青阳文集》,编印过《敬修堂丛书》,重刻过《毗陵高山志》。

吴镛自民国后一直不肯剃辮子的原因,是效仿恩师、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钱名山先生。与胡子石、高吹万并称为“江南三大儒”的钱名山一头长发,梳着发髻盘在头上,一直保留到了去世。

新中国成立后,武进县的政协主席看到吴镛拖着辮子来参加会议,总觉得不妥,多次劝导吴镛剃辮子,被吴镛以“恩师遗风”,或又言“无师命不

敢违背”为由拒绝了。后来,县政协主席找到了钱名山之子钱小山,谈起了这个事。钱小山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常州政协、文联和书协的领导工作,便会同父亲的其他弟子商量后,一同找到吴镛说:“若是恩师在世,看到新中国、新气象,一定十分欣慰,并且剃发。恩师尚且肯剃发,那九泉之下的他,定会允许你也剃发的。”钱名山弟子谢玉岑进一步指出:“恩师为清朝遗民,他留的却不是清朝的辮子,更不剃民国的短发,他只是恢复明代的装束,所以,你这是歪解了恩师的深意。”

听了恩师之子和其他师兄弟的开导,吴镛幡然顿悟,这才同意把辮子剃掉了。



徐悲鸿三绘生肖龙

周惠斌

徐悲鸿以善画奔马著称于世,其实,他的其他动物画作,也不逊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徐悲鸿曾三绘《十二生肖图》,三次创作创作威严神秘的龙,遣兴抒怀,意趣盎然。

徐悲鸿最早创作《十二生肖》册页是在1939年。该册页造型精准,笔墨细腻,是目前已知徐悲鸿构思酝酿十二生肖题材的尝试之作。后为一位新加坡人收藏,被称为“新本”。1945年冬,徐悲鸿在重庆碧溪茅坪中国美术学院绘制的《十二生肖》册页,因送予前妻蒋碧薇,被称为“蒋本”。画作内容基本延续了“新本”的样式,但整体略显沉闷。1946年5月创作的《十二生肖》册页,赠予子女弟子张倩英,故被称为“张本”。该册页笔墨轻松,是徐悲鸿画稿中难得一见的温馨之作。

这三套册页,画面的前后顺序皆

按十二生肖次序排列。最值玩味的是,3幅“龙”的构图、造型和形象基本一致,虽然创作时间不一,心绪有别,然而情怀始终,神韵俱在。

3幅“龙”皆以墨色表现光影,乌云翻卷密布,干湿浓淡、层次丰满。线条勾勒龙头,浓墨画眼,龙须飞扬;龙取水端,腾飞而至,口吐水柱,如在嘶吼,淋漓尽致地展示出龙的威严和力量。龙身则虚淡简化,或如斑纹,或如鳞片,粗细有致,虚实相间,龙足初现,隐隐约约,不仅取得了画面的平衡,而且给人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之感。

徐悲鸿的这3幅龙图,将西方古典绘画的光影写实技法,融入中国传统国画含蓄隽永的写意表现中,笔法精湛,富于变化,文人气质蕴藉,堪称“大师画小画”的经典之作。



茅以升的“桥话”

王荣 王抒滢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和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诗情画意。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桥梁作用。”这段话选自1963年2月《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是“中国现代桥梁之父”茅以升撰写的科普作品。

《桥话》分“桥记”,泛论桥的性质、内容和作用;“桥志”介绍我国有史以来,全国各地所修主要桥梁的扼要概况;“桥史”,就我国历代的名桥、古桥、大桥、长桥、奇特及特殊小桥等各种类型的桥,选其有代表性的约50座,记录其修建简史、结构特点及历史维修经过;“桥工”,包括桥匠、讲述了我国历史名桥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以及修桥名师巨匠所作的重大贡献;“桥典”,记载历史上传闻的有关各地桥的各种故事、轶闻、佳话来说明桥在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桥景”,就一些名胜地方的桥梁,指出桥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历史上名人居桥边的故事;“桥名”,对全国各地桥梁的命名作系统性的叙述,附带一些名桥的命名故事;“桥文”,从我国历代重要文学作品中,选出包含桥梁字样的“断句”,以及文学家对桥梁的印象,

大多从唐诗、宋词、元曲中选材。《桥话》于1997年9月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茅以升先生,一生钟情于桥梁,谙熟于“桥经”,对于“桥”的意义有着深邃的理解和广泛的引申,他还有许多寓意深刻、富于哲理的“桥话”。他说:“要说桥,它的含义很广,有物质的桥、精神的桥、友谊的桥。”“爱国,心路之桥;奋斗,征途之桥;坦诚,友谊之桥;科教,兴国之桥;科普,育才之桥。”茅以升认为:“科普是一座通向四化的桥梁。”

1979年,茅以升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匹兹堡华人协会欢迎会上,茅以升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准备架起一座桥梁,一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界,一头是美国科学技术的界的中国同胞,我们愿意搭这样一座桥梁,让各位在桥上走过。”他的话在美国华人科技工作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晚年的茅以升说过一段充满哲理的人生格言:“人生一征途尔,其长百年,我已走过了之七八,回首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高晓声丢三落四

周星

高晓声丢三落四的习惯是出了名的。

20世纪80年代初,他和沙叶新等人去香港参加文学活动。刚到香港不久,高晓声就出了问题。一会儿这个东西找不到了,一会儿那个东西找不到了,弄得整个团队都时刻为他捏着一把汗,生怕他再出现新的状况。为此,有人建议高晓声每样东西都要准备两份,比如护照,无论如何也要复印一份,万一丢了,还有备用的。另外,他一直随身带着银行存折,总担心会落到别人手里,但却常常把存折遗忘在宾馆。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次团队去香港采风,他什么也没带,却把自己弄丢了。大家怎么也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团队。于是有人笑着说,高晓声最好应该把自己也复印一份。

高晓声到美国讲学的时候,操着一口常州方言,一般人根本就听不懂。友人建议他说普通话或请个翻译,高晓声却自有妙论:“他们讲的话,我不是也听不懂吗?”他寄住在一位美籍华人家里,一次去大学讲学,出门时走得匆忙,左脚穿了自己的鞋,右脚竟穿了主人的鞋。两只鞋颜色不一,大小不一,而且都是左脚的,他竟然也穿得出去,而且是穿着登上了美国名牌大学的讲台。回来时,主人一见面说他今天把鞋穿错了。高晓声顿时醒悟,直拍大腿说:“怪不得我今天觉得右脚这只鞋夹脚,那么痛,原来是你的鞋跑到我的脚上来了!”两人在笑声中化解了尴尬。

其实,在众位文友的眼中,高晓声天生忠厚、善良,大家不仅喜欢他的作品,更喜欢他这个人。

非常年代的外交干部短训班

张 刃

日志中,可以一窥短训班的简略概况:

1973年1月22日,星期一,农历腊月十九,英法西语教员全体第一次会议,听取第一期短训班情况介绍。

外交部目前急需:1.翻译;2.使馆口头交涉(行政业务);3.调研。

短训班分两种。一.会话班,要求经过半年培训能够用简单英语会话,能在使馆内进行简单交际、寒暄及外交业务,能说完整句子,虽有发音、语法错误,但外国人能听懂。二.阅读班,要求经过半年培训能够看懂一般外电及简单评论。

短训班要注意的原则:1.听、说、写、读有所侧重;2.结合外交业务、具体工作;3.大量实践。会话、阅读都是用于实践,教学方法也要采取大量实践。精讲多练,少讲语法理论,少举例子,少做单句练习;学阅读就要多练多看,会话就得得多听多说,练习方法要多样化。(语言不是词汇和语法的简单组合)

编写教材要针对只有半年时间的特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选些新的教材,如尼克松访华、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某国)政变等。在老教材中选一些有历史意义的。

口语教材10个单元:1.语法、问答句(结合外交事务);2.招待会、宴会餐桌上的用语;3.采购;4.交际寒暄;5.使馆接待;6.电话、礼宾;7.机场、订

票等;8.事务性业务,银行、贸易等;9.综合性单元(对外交际结合对外政策);10.政治性的,就当前国际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表态。

阅读教材10个单元:1.中美问题;2.台湾问题;3.越南问题;4.苏美关系问题;5.联合国;6.中东问题;7.非洲首脑会议;8.政变;9.欧洲共同体;10.选择研究一个国家(如菲律宾)。

会话多样化的练习方法:1.死记与活用结合,缺一不可;2.做没有准备的谈话;3.每星期一学员向教员汇报一周干了什么;4.每天教员和学员谈15分钟话;5.用录音机;6.辅助教材(英语900句);7.看电影,先录音、打印,再去看;8.小型演出,请学生自编,内容为使馆、机场用语等。

阅读多样化的练习方法:1.每篇起码30页,教员讲一个半小时,其余时间均为学员自习,半精读;2.循环学习;3.课外大量泛读(英文电讯、英文参考消息、亚非国家报纸、把新闻编成材料给他们看)。

阅读班分两种:一是出国搞调研,有时需要用口语;一是在国内,大部分搞调研。今后争取做到绝大部分学员出国,大量搞口头工作,故要求学员两个标准:一种是搞口头工作,看报纸生字连篇,但查字典能看懂;一种是中文水平相



1926年底,茅盾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仅仅42天时间,就为这份“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报”创作了34篇文章,影响广泛。

主笔《汉口民国日报》

1926年12月上旬,沈雁冰(茅盾)接到武汉来电,党中央派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教。月底,茅盾到达武汉。

1927年4月初,中央决定让茅盾主笔发行量超过万份的《汉口民国日报》。

《汉口民国日报》于1926年11月20日创刊,馆址设在汉口歌生路忠信二里4号(现江汉路泰宁街2号),编辑部设在德安里1号;董必武任经理,主编宛希伊,毛泽民负责行政工作。

《汉口民国日报》是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和国民党湖北省和汉口市党部共同筹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汉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市党部联办,后改为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也是共产党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

这张报纸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宣传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报道北伐战争的胜利,支持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帝国主义与新旧军阀的罪恶行为,在全国及国际上颇有影响。

4月29日署名“雁冰”的社论《欢送与欢迎》见报,内容涉及欢送北伐将领出征,国际工人代表回欧,欢迎日本工人代表抵鄂。翌日,茅盾又发社论《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节》。

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5月4日的《汉口民国日报》,同署“雁冰”发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是《“五四”与李钊同志》,指出:“我们对于李大钊同志等的被害,无限的悲哀,我们一定要从悲哀中生出更大的勇气与反革命派决一死战。”第二篇是《革命者的仁慈》,揭露蒋介石秘密绞死江苏党部负责同志等20余人的残暴罪行。

1927年5月5日,茅盾发表社论《五五纪念中我们应有的认识》,指出:当日是马克思的生日,也是6年前孙中山就临时大总统之日,应把“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使命,切实担负起这个使命来”。

5月7日署名“雁冰”的社论《廿一条》与一切平等条约》发表。9日署名“珠”的社论《袁世凯与蒋介石》,指出:“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袁世凯,他比袁世凯、张作霖、孙传芳等更能学袁世凯……他的覆亡一定比袁世凯更快,他结局一定比袁世凯更坏!……打倒袁世凯后身的蒋介石!”